



學苑出版社

傅夢弼集

論討史的定位及其他

陳學樂以成校

秦州雜詩十四首

秦州天水郡屬隴
道公避地至此

滿目悲生事

言自華州開輔饑棄官入秦州
之由蓋變故多端生埋蹇塞有

不勝其悲者

因入傍人也即路難
悠悠長傍人句

作遠遊遲回庶

隴快浩蕩及關秋

許德楠◎著

坂九廻不知
秦川長安如燕

過此能不水落

空鳥鼠谷秋

论“诗史”的定位及其他

许德楠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诗史”的定位及其他/许德楠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4. 4

ISBN 7-5077-1903-0

I. 论… II. 许…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②杜诗-文学研
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538 号

责任编辑:王芳荣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峥峥印刷厂

开本尺寸:850×1168 1/32

印 张:11.75

版 次:2004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

定 价:25.00 元

前 言

这是一本古典文学研究丛稿。分为“诗史篇”（以“诗史”和杜诗研究为主）和“视角、形式篇”。其中大部分篇章都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整理出版，文字有所润色或修正。

我国古典文学史源远流长。虽然从表面现象看，古代的诗词歌赋、小说传奇，乃至变文俗讲、元曲南戏……，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现代当代的许多文学样式（如新诗、话剧、歌剧、长篇短篇小说等），起码在形态上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但是，总体来讲，无论是在文化内涵、美学品位、表现形式、文学语言诸方面，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还是十分紧密的。

因此，人们重视探索古典文学史与当代文学的衔接点，探讨文学史上的重要规律，如何能适用于当代文学，以利于后者的健康发展。

由于“诗史”的产生和发展，颇为集中地反映着文学史中带有根本性的理念乃至争论，所以本书谈这个问题较多。涉及“诗史”产生的历史和文学条件、“诗史”在理念上的定位、“诗史”诗人的“排名榜”、“诗史”问题中的“钱谦益现象”、“诗史”诗人的籍贯“南移”现象，等等。

由于杜诗在若干方面，代表着古典诗歌的颠峰成就，所以本书论及杜诗的篇章也较多。其中涉及杜诗的“以我为诗”、杜诗给诗学以新的文化元素、杜诗的“历史命运”、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等等。同时，以新的视角，观察了历代对杜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的认识价值。

由于李杜“诗仙”、“诗圣”的桂冠，在全部诗史中具有“双子星座”的标志性的意义，所以也有篇章论及“诗仙”、“诗圣”内涵的定位，及其外延的嬗变。

由于杜诗的“言欲”（王夫之语）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及

王国维所倡的“无我之境”实际上是“无欲”的境界——“言欲”和“无欲”形成文学史上的聚讼的某种焦点，所以，本书也注意及此，有所论列。

由于古代散文文学与诗歌文学，在各个朝代，整体上呈现“雅俗互补”的格局，并对当代文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所以本书也给予一定的篇幅。

另外，我国古典文学，除了与各国文学有着共性，尚有其独特性及特殊的品格。如我们的古诗在艺术上要求高而使用上大于艺术领域，也就是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写得惟恐其不精”与“用得惟恐其不泛”的事实。但这一对矛盾仍很协调——协调于诗、史同源，也协调于人文社会对诗的一般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或倡“言志论”：“诗言志”（《尚书·舜典》）、“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张戒：《岁寒堂诗话》）；或略变化为自我抒发论：“……心体震悸，若不可活，遂发之于诗”（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愚为诗为文一也，所务得诸己而已”（司空图：《疑经后述》）；或倡慰藉论：“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咏怀，以慰其心”（《诗经·大雅·烝民》）、“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王逸：《楚辞章句·序》）。这些看法都是让个人诉说于社会，让社会接受个人；都与个人、社会的协调有关。换句话说，古诗甚至起着人文社会保持平衡的某种协调作用。或者说，古诗的内圆是艺术，外圆大于艺术，这是同心圆。从这个意义说，古诗又是“大于诗”的。对这种关乎文学的特殊的社會价值和令人饶有兴味的问题，本书也加以申说。

本人自揣浅陋，水平不高，但也在努力探索文学史上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本书若有缺失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2004年1月

目 录

一、“诗史”篇

- (一) 论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 (1)
- (二) 论杜诗“以我为诗”…………… (13)
- (三) 论杜诗的“故国平居有所思”…………… (29)
- (四) 论“诗史”的定位(一)…………… (42)
- (五) “诗史”桂冠的排名榜
——“诗史”的定位(二)…………… (57)
- (六) 杜诗中的“银章”与“省郎”…………… (71)
- (七) 杜诗中的“理语”与“理趣”…………… (85)
- (八) “携仗东山”和“莫学野鸳鸯”
——简论李白、杜甫的女性观的一个侧面…………… (103)
- (九) 铺叙感慨的需要,诗体发展的必然
——论杜诗的“排律”…………… (114)
- (十) 历代对杜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的认识价值…………… (134)
- (十一) 附:怎样看待王夫之对杜甫等古代作家的批评?…………… (151)
- (十二) 杜诗给诗学以新的文化元素…………… (161)
- (十三) 从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再谈杜诗的“历史命运”…………… (173)
- (十四) “诗仙、诗圣”内涵的定位及其外延的嬗变…………… (189)
- (十五) 从“钱柳因缘”到“诗史”桂冠
——论“钱谦益现象”及“诗史”诗人

- 的“南移”现象…………… (203)
- (十六) 文化女奇人：柳如是
——从《柳如是别传》谈到《柳如是
诗词评注》…………… (218)
- (十七) 中华文化的“千年龙”现象
——写在 20 世纪结束之时…………… (226)
- (十八) 民族文化认同“千年”走势中的
几个问题…………… (233)

二、视角、形式篇

- (十九) 论古典文学艺术中的两种独特视角…………… (251)
- (二十) 论文学史上散文与诗的雅俗互补的
发展格局…………… (261)
- (二十一) “竹林七贤”到底“贤”不“贤”？
——论“竹林七贤”的存在条件…………… (278)
- (二十二) 嵇康在《幽愤诗》中何曾“忏悔”过？…………… (288)
- (二十三) 谈清宫戏的“火”
——兼及它对历史认知的正负面影响…………… (295)
- (二十四) 儒文化典籍中的若干“系统比喻”现象…………… (306)
- (二十五) 衔接、转换中见真情
——谈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两个问题…………… (312)
- (二十六) 从“杜鹃”形象，看典故的使用、
变异和重组…………… (323)
- (二十七) 宋词三阶段：婉约、豪放、醇雅
——典型的“一分为三”的文学
发展形态…………… (330)
- (二十八) 答客问
——关于“恢复”文言文…………… (343)
- (二十九) “无欲”与“言欲”之辨…………… (348)

(一) 论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

本篇摘要：探讨杜甫的“三狂”——即“狂顾”、“狂走”和“狂歌”——精神。“三狂”都是杜诗中的自况。如“狂顾”含有在浪游中瞻念故国的意思。诗人的“狂走”体现了漫游生涯，“狂顾”体现了人文关怀，因而能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狂歌”不已。所以，总的说，它们概括了老杜的生活道路，也表现了少陵的创作品格和人生理念。同时，本篇在“狂放”方面，将杜甫与李白、阮籍进行了扼要的对比：杜的“狂而简”是“入世”的，是自苦；李的“狂而肆”是“济世”的，是自重；阮的“狂而谑”是“避世”的，是自怜。

—

杜甫具有“三狂”精神——即“狂顾”、“狂走”和“狂歌”。这种精神使杜诗从诗人的心路历程出发，向华夏的榛莽大地走去，最终达到了古典诗歌的颠峰。

“三狂”都是杜诗中的自况。少陵笔下的“狂顾”含有在浪游中瞻望故国河山和系念国家命运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了杜甫的诗格，因为这是他作为伟大诗人的不断吸取艺术营养激发创作热情的需要。“悲辛但狂顾”是在《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中说郑虔的：“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也是杜甫的自况。“狂顾”的出典，见于屈赋的《抽思》：“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王逸释“狂”为“遽”。杜甫的“狂顾”已经超越了这种用法。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顾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

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镡，飨以佳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里“狂顾顿缨”指挣脱藩篱；似乎“悲辛但狂顾”也含“狂顾顿缨”的意味。

杜甫使用“狂走”，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狂走终奚适”；吟诵了他的浪游生涯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而“狂催走”一语，更准确传神地描述了诗人的浪游是主客观条件下的产物：“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忆弟二首，时归在南陆浑庄》之一）另外，“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上水遣怀》）的“中风走”，也是“狂走”的意思（因为“狂走”原出于朱浮的《与彭宠书》：“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同样道出了壮志受挫而浪游的心态。

杜诗中的“狂歌”则见于“狂歌托圣朝”（《官定后戏赠》）、“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望牛头寺》）等。

《抽思》中的“狂”，经杜甫如此化而用之，后人则继续使用老杜的用法。如元好问诗：“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再如陈寅恪诗“十载长安走若狂”。特别是陈寅恪氏的这句诗，隐括老杜的“狂走”，诗意和句法均颇为老到。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杜甫的“三狂”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由于诗人遭遇乱离的世道，他不得不走上一条漫长的浪游之路；在主观上，他也选择了这样的“狂走终奚适”的不归之路。而“昔人戒垂堂，今则奚奔命？”（《早发》）这里的“奔命”，也可以作“狂走”的注脚。总之诗人的“狂走”体现了漫游生涯，“狂顾”体现了人文关怀，因而能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狂歌”不已；毕生不倦地进行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创作。“三狂”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体现了杜甫的爱国、热爱大好河山、接近人民，并喜爱在漫游中进行诗歌创作的境界。同时，“三狂”精神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框架和背景的。在民族的斗争和融合中，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士庶人民向南方“崩奔”的

现象。在杜甫的时代，如杜甫所描写的“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追酬故蜀州人日见寄》），李白所吟咏的“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之二）。可以说，“狂走”就是具体的、特殊的“崩奔”。所以，杜甫最后的漂游南方，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如《江南逢李龟年》吟诵大历五年（770）在潭州（长沙）与李龟年邂逅，《长沙送李十一》记叙在潭州送别重逢的旧友李衔，都说明在杜甫“狂走”的路途中，不乏同路人。

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诗人高歌：“漫卷诗书喜欲狂”。从这样的充满激情的诗句中，人们颇能看出少陵的好诗酿造的条件：在“狂走”与“狂顾”中，不断催生着“狂歌托圣朝”。从另外的角度看，杜甫自称“杜陵野老”（《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杜陵野客”（《醉时歌》）、“野叟”，即一生为官的时间极少，基本是一介布衣。这与他的“三狂”品格，也是平行的。总的说，“三狂”是诗人一种特殊的无怨无悔的，脚步、舟楫不能停歇的浪游情结、创作品格和人生道路。

杜甫的一生最突出、重大的抉择是：不恋栈于“唐代小臣”（这是古人怀着同情对杜甫的如实描写）的地位；不深陷于卑微而温饱的幕僚生活；不滞留于亲手惨淡经营起来的草堂——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毕生漫游之路。

杜甫一生浪迹天下。在前期曾壮游吴越赵晋齐鲁梁宋，这也是当时相当多的文人的时尚。在后期，他本应结庐在相对固定的地方；但时局和生计又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不能不流离陇蜀。然而，当严武最后一次镇蜀后不久，为什么杜甫还是辞掉幕府职务、义无反顾地踏上浪游荆湘的不归之路呢（虽然他曾在成都草堂逗留、犹豫过）？诗人不可能预见他的靠山严武会壮年暴死（严武之死当然使他最终无可留恋）。他和严武可能的交恶，也只是后人的揣测之词。所以，浪游性格的驱使，应该是后期杜甫变本加厉甚至狂热地漂游的主要动机之一。沿途的动乱，更促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之，终其一生，他是在漫游（从壮游到流离到

漂泊)中度过的。历来认为杜甫这是为了辗转回返东京洛阳一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但这似乎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因。缺少旅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杜甫难以回返家乡;如《赠韦七赞善》一诗记叙送别北归长安的韦七赞善,说明贵胄子弟北归的路途仍是畅通的,而杜甫只有望乡兴叹,继续漂泊。

“如何关塞阻”诚然是使少陵限于困境的实情,“转作潇湘游”(《去蜀》)却是诗人另一种郑重的选择。甚至“老夫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浩荡前后间,佳期付荆楚”(《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更觅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舵”(《忆昔行》)、“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寄题江外草堂》),等等,成为他浪迹荆湘的理由和信念。湖南的亲友挽留过他,诗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狂走”、“崩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如果换了别人(平庸一些的人),在那样的充满战乱的世道,也可以安于“小臣”的位置,或满足于幕府生活[这种生活是卑微而温饱的,虽然是遭白眼:“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久客》)、“肉食哂菜色,少壮欺老翁。况乃主客间,古今逼侧同”(《赠苏四偁》),但有安稳,有酒喝],而不必如杜甫这样,足茧荒山,一叶扁舟,漂泊浪游,客死蒿莱。我们要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从根本上讲,杜甫是不能忍受朝廷(如代宗)的行事,不愿苟活于庸碌的幕府生涯,特别是,要完成他所甘愿承担的诗歌创作的艰难的历史使命,才选择了“狂顾”——即在浪游中进行诗歌创作的道路的。少陵倾其毕生的精力,凭借其史笔诗才(如元稹所讴歌的“杜甫天才颇绝伦”),和诗歌世家的百年资质积累(所谓“诗是吾家事”),勇敢地面对并完满地回答了在诗歌发展史上必然遇到的几大课题的挑战。这种时代和历史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诗歌要不要表现,中华民族必然遇到的大规模的民族斗争、融合的内涵,形成“诗史”;诗歌能不能反映广阔的社

会生活，“以时事入诗”；古色古香的古体诗，要不要发展为节律精密的律诗——特别是长篇排律。而要真正完成这一使命，杜甫必须具有“三狂”精神和品格。

二

对杜诗的成功经验，古往今来有无数的评述。评述是从各个方面立论的，有的是理性的，有的甚至带有神秘色彩，但都常常接触到杜甫的客观上实际存在的“浪游”生涯，以及杜甫的主观意志、创作激情。如王士禛说：杜陵“……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1]——“漂泊”等等是客观存在的浪游；“浑脱浏漓”、“顿挫独出”是主观方面的创作激情。

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七《跋鲁直蜀中诗词》：

“杜少陵、刘梦得诗，自夔州后，顿吴前作。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观此三帖，盖可知也。”^[2]

这话虽然说得“悬乎”了点，其实还是接触到了“浪游”对创作有所助益的问题。

宋·张方平：《读杜诗》：“流寓四方路，浩荡平生心。”也概括了杜甫在浪游四方中吟咏国事的诗格。也可以说，对杜诗的成功，概括为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流寓四方路”和“浩荡平生心”；前者是“狂走”般的生活体验，后者是“浑脱浏漓”的创作激情。

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张安道即张方平。）这里，“天意遭奔逃”与“流寓四方路”，诗意是平行的。“奔逃”竟是“天意”，说明杜陵的诗歌成就（“扫地收千轨”是集大成，“争标看两艘”是李杜齐名），是有赖于“奔逃”即“流寓四方路”的。

高适（接续杜诗的诗意）称杜甫为“东西南北人”：“龙鍾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遗》）也是说杜甫以四海为家、居无定所。宋人何梦桂在《永嘉林霁山诗序》中也说：杜诗的“长篇短章，横鹜逸出者，多在流离奔走失意中得之。”

不必是“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而是因有“浩荡平生心”，加上“流寓四方路”（乃至“奔走”、“奔逃”和“身行夔路”），自然诗词超妙。杜甫一生，正是以“野叟”、“野老”、“野客”的姿态，悯时伤乱，奔走呼号，“狂歌”不已。

古代文士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就是漫游或浪游。如谢灵运、李白、顾炎武等都以游历山川而知名。原因则是多方面的：纵情山水、关注民情、游学会友、寻诗摘句、求仙访道、考察山川形势，及流亡等等，不一而足。但一般发生在人生的一段时间之内。像杜甫这样，毕生浪游，颠沛流离，还是较为鲜见的。这样的浪游情结也许是较难理解的，但我们不应用对待一般人的眼光来审视杜甫。作为一个可以代表唐代诗歌乃至全部古典诗歌巅峰成就的诗人的杜甫，这种品格和情结，无疑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这样的如“夸父逐日”般的浪游的品格，说明了诗人对真善美和艺术的不倦追求，对故国山河的深挚眷恋。何况，这也是巨变的历史和乱离的世道给予杜甫的。正如古人针对杜诗《发秦州》、《发同谷》所说：“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真诗史也。”（《杜诗镜铨》卷七引李因笃语）——“三狂”精神、浪游情结对于杜诗的“诗史”成就，是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我们不应从消极的方面，理解杜甫为何进行诗歌创作，如有

的著作中所诠释的那样：“杜甫的晚年生活，真是穷愁潦倒。这一时期的诗，都是哀音满纸，使读者悱恻无欢。但是他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夏季，离成都东游，在渝州（重庆）、忠州（忠县）、夔州住了一个时期，又南下到沅、湘而最后死在耒阳，这六七年写的诗却最多。大概无聊之极，止有天天吟诗，才能稍稍发泄他的忧郁悲愤的情绪。”——这种对于杜诗创作的较消极的读解，不能不认为是对“诗是吾家事”的杜陵诗歌世家和杜甫的诗歌历史使命感的忽视，也是对唐代士人与诗歌的魂牵梦绕的紧密关系的漠视吧。

三

“狂”屡见于杜诗，他的“狂”也是有其发展历程的，从早年的“裘马颇清狂”（《壮游》中的回忆），“更调鞍马狂欢赏”（《乐游园歌》），到“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等等。

诗人描写自己的日常动作，有时也状以“狂”字，如：“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篱”（《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八）。按：“白接篱”为古时一种头巾。《钱注杜诗》：“白接篱：尔雅注：白鹭翅上有长翰毛，江东取为接篱。”^{〔3〕}——《新唐书·杜甫传》：记叙严武待杜甫甚厚，亲至草堂，老杜“或时不巾”。这也就是“狂遗白接篱”吧。

杜甫是否真的“狂放”？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他似乎是处处小心翼翼的，自己也声言“奉儒守官”。因此，似乎不好肯定老杜的这种“狂放”。其实，杜甫确有内敛外狂的另外一面。杜甫的一生，如前文所述，有两大问题（或说是两大行径），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一、弃官和不奉诏；二、离开蜀地，并未北上辗转返回洛阳故乡（虽然是因战乱的阻隔），而是孤舟东下，浪游荆湘（虽然少陵吟诵着“东游西还”，实际是离故乡越来越远）。——如果从杜甫的“三狂”精神来加以适当索解，也许能

回答以上的两大问题。

当然，同为“狂”，杜甫与阮籍、李白是有所不同的。阮籍是在大将军司马昭身旁，佯作狂放以避祸。李白是表里如一的狂放。杜甫则是在总的“奉儒守官”的（虽然最后“守官”而守不下去）原则之下，具有一定条件下的“狂而简”的品格。

如果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杜甫“狂”的可贵。阮籍的狂放与杜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阮籍的“狂”的表现是：嗜酒如命，不尊礼法。他以大隐于朝的姿态，既受司马昭的保护伞的荫蔽，又和司马氏若即若离。既接受曹魏重臣蒋济的召辟去作掾属，又虚与委蛇，旋即告辞回家。既作过司马氏的贴身僚属——从事中郎，又去作曹魏皇室的散骑常侍。后来虽然不作司马昭的僚属，却经常出入司马昭的大将军府参加饮宴，又装醉拒绝与司马氏联姻。这样佯作“狂”态，玩弄平衡。当然，阮籍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李白的狂放则是另一种表现。这里可以坦然表白了李白的政治理想的《永王东巡歌》（之二）为例，来考察李白的狂放：“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面对安史之乱，二帝（玄宗、肃宗）蒙尘，四海鼎沸，李白向永王请命和表态，愿作指挥若定、谈笑间使胡虏灰飞烟灭的统帅人物；气势超迈，豪情满怀。虽然说了点说大话，然而，李白的大话却能赢得不朽的诗名。原因在于：首先，李白的狂放是人所公认的，正如杜甫所描写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人们不在乎他说的是大话，而欣赏他的豪情。其次，李白的诗才是无与伦比的，“为君谈笑静胡沙”这种艺术上的横空出世的魅力，能淡化和掩盖他的傲岸和桀骜不驯。

如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之《杜诗凡例》二十则之十八所说：“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简。其在成都，结庐枕江，与田夫野老相狎荡，便有傲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云安，得钱沽酒，时招郑虔；后去夔州，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

此与谪仙之千金散尽者，同一磊落襟怀。宜其诗品迥出寻常。”他举的事例也许并不全面，但是对于李杜“狂而肆”、“狂而简”的概括是较为准确的。这里的“肆”指汪洋恣肆；“简”即简易，含性情简易和善的意味（也有一定的“简傲”的意思）。也就是说，杜甫的“狂”是内向的、内敛的、孤傲的，而不是向外发泄的，是倾向于自我委屈甚至自我“放逐”的（如“狂走”）。——而对于阮籍，不妨以“狂而譊”来加以概括。

也可以说，杜甫的“狂而简”是“入世”的，他的“狂”是委屈自己；李白的“狂而肆”是“济世”的，他的“狂”是发泄自己；阮籍的“狂而譊”是“避世”的，他的“狂”是保护自己。——因为杜甫的“三狂”精神总的说就是强烈的“入世”精神，甘愿抛弃“小臣”的俸禄和幕僚的温饱，受苦受罪去“狂走”，以求得自身不与昏庸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道德上的满足，和诗歌的高质量的丰收。李白则不但要入世，其“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境界尤其表现了“济世”情怀，自然要发泄对世事的不公。而阮籍的“避世”无疑是为了在乱世中和暴君面前苟全性命。——所以，李白是性情的狂；阮籍是佯装的狂；而杜甫是进取的狂（《论语·子路》：“狂者进取”）。透过这样的简单比较，也许能更深一些地读解和进入杜甫的“三狂”境界。

四

三狂精神与正确的处世的态度（包括创作态度）是一致的。《杜诗掇》释《风疾舟中伏枕》诗说：“……‘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首句言到处兢兢，次句言浪游非止一方也。”^[4]——不但表明浪游确是诗人的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说明杜甫对各地人民和风俗是充分尊重的，甚至是爱护倍加、小心翼翼的。

三狂精神与抛弃官场的尊荣的理念也是平行的：如“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颍客，荣贵如粪土。”（《贻阮隐居

昉》)“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发秦州》)“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遗意二首》之一)——这些诗句中的“荣贵如粪土”、“应接非本性”等,对于诗人是真实的内心表露。

因为,这种思想与浪游品格是互动的。如“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独往”,见于《庄子·在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可见杜甫的浪游和弃官漫游独往独来的素志是互动的。“三狂”说明杜甫以漫游为乐,同时也是乱离情势下面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当然,后来杜甫也饱尝浪游的辛酸和痛苦;但是他并没有后悔。

杜诗中又多次吟咏自己的“谋拙”或“计拙”:“楚岸行将老,巫山坐复春。病多犹是客,谋拙竟何人。”(《太岁日》)“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发秦州》诗中也说:“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这些,与其说是自惭于,不如说是自诩于“谋拙”。因为老杜的“谋拙”是乱离的世道下面,一些士子的必然命运和遭遇。“计拙无衣食”,也是对陶渊明“生生所资,颇乏其术”的、应有之义的呼应。如果人们同情渊明的清高,也应该理解杜陵的困窘。

“三狂”与诗人的“谋拙”,也是一致的。从深一些的层面来说,为什么“谋拙”?是因为甘于因“谋拙”而清贫,以换取诗歌的丰收。杜甫也不讳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也可以说,杜甫的“计拙”、“谋拙”、自奉维俭,与“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据说,受赠的“南卿”就是《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诗中的吴郎)那样的慷慨大方,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三狂”精神的各种外在表现。